

網絡動員： 中國特色的社會動員

● 張濤甫

在中國當前的社會運動中，互聯網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互聯網的深度介入成就了當前中國社會動員的獨特景觀。其中，網絡動員尤顯突出。研究中國社會運動，如果繞開互聯網社會動員，恐怕很難觸及到中國當下社會動員的要害。

一 社會動員：現實社會的功能性闕失

在當下中國網絡動員之所以如此活躍，往往與現實社會的功能性缺失有關。網上世界的風風雨雨，多是由現實社會的問題和矛盾引發出來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在動態而艱難的轉型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去全能主義」的漸變過程。這一轉型一直是以漸進式、臨場發揮的方式推進的。主要表現為：通過市場化改革和社會改革，慢慢地「軟化」、「鬆動」改革前的「全能主義」社會結構。一般認為，在「全能主義」社會，呈現「強國家—弱社會」格局。「全能主義」國家體制本身就先天缺乏體制內的監督機制。在「全能主義」下也沒有自主的市民社會。

中國通過市場經濟改革逐漸滋育出的自主社會細胞，逐漸在非政治領域中形成日益擴展的自主社會空間，存在着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領域「有限的多元化」。而改革以後形成的「弱社會」處在體制外，缺乏對國家官員的有效監督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因經濟增長與權力不受約束而造成的種種腐敗與社會不公現象，就會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變本加厲。一旦出現社會不滿與社會矛盾激化，就會進一步引發國家對社會加強權威控制的慣性衝動。「強國家」運用無所不在的行政機器，試圖通過加強控制的方式，把社會衝突壓抑在一定範圍內。這樣，就會出現「社會矛盾—加強控制」的路徑依賴，即通過加強控制、約束社會自主空間的方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與矛盾。久而久之，這種自我強化的路徑，就會引導人們不自覺地進入一種路徑鎖定狀態^①。

有目共睹的是，社會轉型釋放出巨大社會活性。但這種社會活性並沒有根本上改變「強國家」邏輯，甚至會激發「強國家」意志的衝動。「強國家」意志以追求「剛性穩定」為目標，在「維穩」壓力下將被改革激活起來的社會力量納入國家秩序框架。正如同于建

嶸所分析的，中國目前的社會穩定是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以壟斷政治權力為制度特徵，以絕對管治秩序為表象，以國家暴力為基礎，以控制社會意識和社會組織為手段。它缺乏制度彈性和韌度，忽視了內在的整合和發展轉型的適應性要求。其結果是，政治體制用來維護自身生存和運行的成本愈來愈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並不一定同步提高。從長遠來看，一旦政治體制的維護成本超過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現社會無序和衝突失控，「剛性穩定」就可能演變為「社會動蕩」②。

更為嚴重的是，社會活性與「強國家」的「剛性」之間的衝突時有發生，進而撕裂中國社會，並形成了愈來愈龐大的底層社會。底層社會是當下中國社會運動的土壤。近年來，頻頻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更多源自於「底層政治」。于建嶸認為，「底層政治更多的是底層民眾的自發行為，其行為方式也許是隱性的、自發而零散的」。它「是反應性或應對性的，它是對現實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滿尋找解釋的方式和解決的路徑」③。「底層政治」以其特有的邏輯，在中國社會尋求表達空間。它一方面在現實層面尋求解決路徑；另一方面也從網絡世界尋求解決空間。中國互聯網的社會動員功能正是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釋放出來的。

二 網絡動員：對現實闕失的救濟

從技術主義的角度看，互聯網在中國的擴散過程頗具戲劇性。歷史上似乎沒有哪一種技術能如此深刻地改變中國社會。當初，互聯網在進入中國之時，管理者並沒有把它作為一般

意義上的大眾媒體予以規制，更沒有意識到互聯網會釋放出那麼強大的傳播與表達能量，僅把互聯網視為一種商業性的技術媒介。管理者對網絡媒介的商業功能有較高的預期，相應地低估了其政治功能。正是出於對互聯網的技術化和商業化理解，導致管理者沒有把互聯網納入到傳統媒介管理框架。其結果是，互聯網從「強國家」結構中走了出來，進入了社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媒介。

有學者指出，「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經常性張力會持續引發政治對立。現存政治結構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聯動關係正在形成，就像電子民主與借助互聯網力量的底層動員的發展，在使得公民參與的傳統形式充滿活力。」④在公民社會相對成熟的西方社會尚且存在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經常性張力，互聯網的崛起有助於電子民主和底層動員；而對於公民社會才剛剛起步的當下中國而言，互聯網對現實社會力量的救濟顯得更為重要、迫切。互聯網的介入，釋放出巨大的外部效應，增強了社會的結構性力量，深刻改變了國家—社會的力量對比，也提升了社會對國家的博弈能力。在中國現實社會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仍然牢固的情況下，互聯網廣泛而深入地介入，大大改變了國家—社會實力極不對稱的現實。「網絡社會」的超速成長，使中國的社會邏輯得以改寫。在互聯網空間，迅速崛起了一支超規模的「意見群體」。著名媒體人周瑞金稱之為「新意見階層」⑤。這支龐大的「新意見群體」會成為網絡社會動員的強大動力基礎。

中國特殊的社會轉型路徑造成了社會運動的功能性萎縮。值得關注的是，因有互聯網作為依託，「底層社

會」與「新意見階層」經常會合在一起，引發為社會運動。當現實社會表達與動員訴求得不到應有滿足的時候，會得到互聯網的救濟。這就迅速彌補了現實表現空間的不足。在當代中國語境下，互聯網動員功能迅速擴張，繼而形成一種「非理性繁榮」。網絡動員功能被過度開發很大程度上是由現實社會的公共表達功能「貧血」造成的。

三 中國特色的網絡動員

在當下中國，網絡社會動員主要表現出以下一些特徵：

第一，社會動員網絡化。網絡媒介的崛起，對中國當下的社會運動構成了救濟。網絡動員既規避了現實風險，同時也推動了運動目標的有效解決。「上訪不如上網」。現實訴求網絡化，社會動員網絡化。這已經成為中國當下社會動員的一大趨勢。

第二，網絡輿論力量，形成社會共振效應，「倒逼」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網絡動員主要體現為輿論動員。由於存在數量龐大的網上「新意見階層」，網上輿論動員容易產生聚合效應，引爆輿論事件，引起群體「圍觀」，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某一話題一旦成為公共焦點，就會迅速形成網絡輿論場，還會牽動傳統媒體的議程跟進，形成共振效應，「倒逼」現實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但是，受輿論周期律的制約，網絡動員經常是間歇性的，一場動員還沒來得及收場，即被下一波輿論熱點所替代。

第三，「草根動員」與「民粹化」。互聯網使「沉默的大多數」變成了社會動員的主體力量。社會動員的網絡化造成中國社會動員的「民粹化」與「草根化」。網上動員受制於「草根」邏

輯。網絡動員即便有精英引領，也需符合「草根」訴求，否則，精英也可能遭到「群毆」。網絡動員的「民粹化」現象，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第四，網絡「極化」現象。在現實社會中，社會動員經常長期受阻，而社會轉型積壓了巨大的社會張力，致使社會情緒淤積甚多。這些社會情緒在現實社會找不到出口，即被轉移到網絡上得到釋放，而且以極端的方式進行表達，顯示出強烈的非理性色彩。有學者發現，網上動員常常採用「悲情」和「戲謔」兩種「情感動員」手段^⑥。「情感動員」已經成為網絡動員的常用手段，而「情感動員」很容易失控，造成網絡「極化」現象的發生。

第五，網上動員與網下行動的互動。「網事並不如煙」。網上訴求從現實中來，也會到現實中去。網上動員不會一直在虛擬世界循環，它會選擇時機在現實社會落地，與網下行動互動，進而推動問題的有效解決。

註釋

① 蕭功秦：〈從轉型政治學看三十年中國變革〉，《探索與爭鳴》，2008年第5期，頁4-9。

② 于建嶸：〈從剛性穩定到韌性穩定——關於中國社會秩序的一個分析框架〉，《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5期，頁113-18。

③ 于建嶸：《底層立場》（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頁255。

④ 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著，任孟山譯：《互聯網政治學：國家、公民與新傳播技術》（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頁3。

⑤ 周瑞金：〈「新意見階層」在網上崛起〉，《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52-57。

⑥ 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年總第9期，頁39-66。